



市民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

卢德友 李 齐

摘 要：诠释马克思“历史科学”并非依循“自然科学”的路径，两者共同分享着历史这个主体性的根基。“历史科学”由以产生的基础是人的历史性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而这恰恰是市民社会为历史所拉开的“舞台”。市民社会通过人的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将自身定位于“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并由此提示在总体的“科学”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之一事。

关键词：市民社会；“历史科学”；感性活动

作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本真地向我们敞开了什么？“历史科学”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有何意指？它又为何被赋予“唯一”的重要地位？我们在解析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发源地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市民社会理论，在人这个历史主体性的中介下，市民社会成为“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市民社会被指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后，遂在马克思哲学中成为一条具有“枢轴性质”的重要线索。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对人的存在方式做出论证，指明“人的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同源同质性。

一、市民社会：“历史科学”的源始出生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提及：“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这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可资援引的直接文本依据，显露马克思对一个新领域思索的端倪，然而马克思却随即删除了这句话，这给后人留下广阔的诠释空间。论及“历史科学”，我们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对它进行规约，这种实证主义解读方式，通常就在当下研究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中上手。作为对此举的质疑，新近的研究力图廓清“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破除当前研究中从“自然科学”求解“历史科学”进而试图构造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妥之举^②。这一基本的理论探索将试图阐明，马克思想要表明的“历史”与“人”之同源同质性，而显明出来的是历史专属于人。从感性活动出发，扭转对“历史科学”的误读，我们才能真切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

那么，“历史科学”的源始出生地存在于何处？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追问，不能不思及历史的本真场境，而市民社会就在关乎历史“发源地”的层面上与“历史科学”相照面。近代以来，人们分析历史多遵从自然科学的解释定向，此举不能谓之“不科学”，但这种从抽象直观上去理解的历史，并未敞开通达真实历史的合理路径。

无论在哲学抑或科学视野中，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终极主题，只是近代哲学在绑架科学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②参见陈立新：《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559~566页。

同时,并没有把这个主题昭示出来,而是以“思”为第一原则代替现实存在的人。笛卡尔在哲学上开出“意识内在性”原则后,以理性为第一原则阐述历史的途径,随即被认为是通向历史的权威通道。在怀疑一切的第一要义下,笛卡尔哲学以划分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来抛开一切假设和规定,将“思维本身”作为一个纯洁的绝对开端,奠定“思”在人类理智认识中的地位。康德则以理性自身乃是自由的规定为逻辑前提,将“理性为自己立法”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从而赋予实践理性的普遍效准。这种理性又被黑格尔延伸至历史这一维度,在思想大胆构筑现实的道路上,思的主体性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达致顶峰。意识内在性所表征的乃是“思”的主体性意识,这使得思辨哲学依寓纯粹的理性思维,将某些先验的原则、形式,抑或是某种绝对的精神、意志作为出发点,无形中把本来属于人的意识抽象化了。巧合的是,这种细致缜密的纯粹思维活动,又受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变相继承。近代哲学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领域遭遇的重大事件,乃是从近代经验哲学内部孕育出来的自然科学。经验的自然科学为自己提出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任务,它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做出推论,找寻自然界和“精神本性”的普遍观念和规律,以为在阐述人的历史上获得某些增进。就它同思辨哲学的斗争来看,自然科学反对根据一些极其遥远的抽象概念进行推理,而是把经验事物当作认识的唯一来源,貌似确有极大的合理性。然而,它单纯地把经验事物认定为个体的表象和体验,否定那些徒具形而上学概念却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如存在、本体等)。自然科学所散发的“有限思维”气质,本无力在关于人与历史的路途上有所道说,但却自以为已领悟到本真的历史。我们毋宁说,在自然科学及其所寓居的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思维虽对经验事物加以整理,却与理性主义共同分享着相同的根基,都始终固守“思”在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中所占据的地盘。在近代哲学对“思”的迷恋而止步于现实生活过程的面前,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始终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

面对思想史的过往变迁,马克思是不可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的,尤其当他将“现实的人”作为理论思考和现实求索的对象时更是如此。“历史科学”断言的提出,果真表明马克思要独辟蹊径地开创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吗?断然不是。我们不妨认为,历史从自然科学的维度进入马克思的哲学视野,才得以将遮蔽在近代哲学背后的人的主体性阐明出来。

那么,历史何以通过自然科学的维度来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源于人们知识论路向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置身其中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时期,在一系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作为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显著体现,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①。自然科学的起点和落脚点本应是人,或者说是人的本质力量,而不再是“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就曾发出疑问:“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②显然,“思”不能担当此重任,因为人自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与人有着源始性的关联。休谟、康德等人或许有所保留,但近代哲学强调人类“思”的主体性这一整体倾向是明显的。对此,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原则对思辨哲学发起的挑战,得到马克思的肯定,并称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具有“真正的发现”。然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也仅仅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在涉及历史的时候,历史对他而言又处于“视野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不懂得“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③。正是因为有人及其“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自在自然界才成为具有历史的感性自然界。总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忘却这一马克思所指明的信念,关于历史的哲学认识路向必将是五花八门的大合唱,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所进行的主观建构中,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就曾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甚至还有人振臂高呼:一切历史都是问题史。

因此,作为一门全面把握人的历史生成过程的“科学”,“历史科学”必定要对迄今为止人类科学活动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的进程有所明示。马克思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阐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通过工业这种人类实践方式,揭示出自然科学对于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和自然界所具有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历史性关系。在此,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认识活动并不构成人本源的、真实的存在方式,惟有感性的物质生产劳动与物质生活关系才得以有此担当,由此将历史中的思辨认识拉回到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即生成成人自身的历史。

从《手稿》时期开始,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点,在哲学上开启生存论路向的革命变革后,他的视野里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也没有抽象的“历史”,因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写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人的科学”并指出它与自然科学的同源性:“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②在随后的《形态》里,马克思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于“历史科学”的理解。可见,不是只有关于历史的科学而忘乎自然科学,后人以“自然科学”范式来框定“历史科学”,并将其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实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恰恰相反,应是“人的科学”或“历史科学”规范、指引和守护“自然科学”。毋庸置疑,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感性活动,终结了抽象的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规定。“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③因此,基于这种属人的性质,我们当由“历史科学”来理解“自然科学”,而非相反。由于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开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在1845年写作《形态》时期的思考,被阿尔都塞指认发生过“认识论的断裂”。

其实,马克思在《形态》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于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既是如此,那么从“历史科学”通达市民社会这个基础便具有展开的可能性。有生命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关切。易言之,市民社会由于自身内部“物质的生活关系”而成为“历史科学”启程的地方。市民社会被指定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就使得马克思所言的“历史科学”本身就建基于市民社会之中。

如是观之,在历史这一维度上,市民社会与“历史科学”达到原初的契合。依循这一路径,马克思将思辨哲学拉入现实生活的进程,从市民社会的地平线上为“历史科学”搭建了活动的舞台。

二、市民社会搭建的历史“舞台”

既然“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道,分享着人这个共同的根基,而且“历史科学”规范着自然科学,那么市民社会中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获得敞开的基础,“历史科学”也随之得以启程。同时,马克思视野中的人不是抽象思辨的人,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历史,这一维度经市民社会展现出来。我们要继续探寻:市民社会具体如何搭建起历史的舞台?

首先,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一些现实的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它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因此市民社会在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前并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而只是作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在欧洲思想传统中,思想家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历经城邦政治与市民精神、到社会契约与天赋权利、再到私有财产与“交往活动”的过程,而这些仅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做出的定位,甚至在旧唯物主义那里直接变成对单个人的直观。马克思则是从生产的意义上来理解市民社会,并将之拉向历史这一场境之中。人类历史过程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就是人的存在及其自身的再生产,因此一切历史认识的前提只能“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

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对于现实的人类史,应当得以确定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人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不仅如此,人类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生产,因为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在于能够生活。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个人肉体存在的生产这方面来考察,它更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毕竟“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②。人们在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时,也是在间接生产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即创造着现实的历史。

正是市民社会中这些现实的人,以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着历史,而并非是某种观念或是逻辑思辨来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那样的历史犹如无根的浮萍。所以,市民社会通过现实的人、人的感性活动,为历史搭建舞台的同时,也从“人”这个角度逼近历史科学的理论内核。

其次,市民社会中的人通过实践来展开自己的历史性。现实的人构成历史的主体后,以实践的方式来展开自身。具体而言,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实践来摆脱异化劳动对人的统治,从而突显人自身存在的历史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受到资本统治和抽象观念的宰制。针对这样的实情,马克思体认到“现实的人”成为人格化的物,在商品拜物教观念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关系被物化了,即“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③。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商品、货币、资本等为载体对人实行抽象统治,将人的一切个性和“作为人的关系”都量化为抽象的、同质性的货币数量关系,带来人们彼此的冷漠。物化社会关系构成货币对人的统治的前提,它集中体现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力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④正是认识到物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即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利,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人对物的占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实质是人创造出来的“物”和“关系”反过来奴役人,人只有打破这种奴役状态才能解放自身,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阐释再次表明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而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历程。正是在市民社会中,人的历史实践过程生成为现实的具体的人。

第三,人的感性活动构成市民社会的生存论根基。马克思之前的市民社会将人的生存状态隐蔽于先在的哲学原则之中,无论是霍布斯、洛克,抑或是黑格尔,其市民社会总是遵循着给定的先在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原则规定人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则是将人当下的生存状态本身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论证人的感性活动。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它力图避免形而上学的二元劈分,将思维活动转向事情本身。对于市民社会生存论根基的人的感性活动而言,马克思通过三层递进的关系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其一,具有深刻感觉的人的丰富性、全面性编织出社会生产关系,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现实。人的感性存在尽管被异化劳动所泯灭,但感性活动却是属于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感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其二,不是在抽象的人以及抽象的社会原则中,而是仅在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中,才能消解诸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等的对立方式,由此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其三,人在社会中拥有的实践力量和方式,使得解决理论的对立本身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⑤以上三点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标示着马克思至今仍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思想家,而并非如汤姆·洛克曼所指认的那样,马克思始终是一个作为“黑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尔最好的学生”的黑格尔主义者^①。马克思后来的“消灭哲学”意蕴,不仅仅在于批判哲学本身在改造世界方面的缺席,更重要的在于批判哲学据以生存的现实,而指明人的生存活动之历史。

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形成缘由的理论建构,为市民社会开出一个生存论的哲学和历史观,它着力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②。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发现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形成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市民社会中尽管存在私利,但个人主体性地位的提高和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市民阶级因此而实现有如曼德维尔所说的“蜜蜂的寓言”,即私恶无意中促进公益。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社会交往的中介,资产阶级逐渐将局部的地方性市场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而世界交往和联系的日益深入,民族国家的历史又逐渐被世界历史所取代,这不可避免地打破各民族原始的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越来越趋同为世界历史。这种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它的动力之源来自于市民社会中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而非所谓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中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加速地推动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地平上建立的“历史科学”,将历史把握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而非僵死的事实的汇集。由此,市民社会为“历史科学”同时也为人搭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舞台。

三、现实的人:历史科学的总体关注

市民社会中的人及其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创造着历史,展示了市民社会作为历史及其“科学”的活动舞台,因此,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提示:“历史就是人筹划生存的演历,人类认识历史就是人类认识自身,人类认识自身就是人类建构自身。”^④那么,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需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成为其他别的什么理论,才能更好地筹划人类的生存演历、认识自身和建构自身呢?

市民社会虽然获得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的殊荣,但并非意味着它的完美无缺,因为其中到处呈现出人受资本和形而上学抽象统治所发生的异化。在市民社会中,劳动者、劳动、资本家与资本之间的异化关系一览无遗。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成为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产品,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以实现自我确证,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难以想象那种没有对象化的劳动。在劳动的异化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意味着劳动者创造出一个独立的与己对立的力量,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劳动者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不能占有自己生产的东西,那么必定有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个人对之进行占有,这就是资本家。这一切又是资本运动的外在表现与结果,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无止境地追求最大利润。针对人类异化的生存状态,马克思通过剖析市民社会中的内部矛盾,为“历史科学”指明贴近守护人的道路。在充分肯定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之后,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性。

基于资本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历史科学”从何种视角来关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呢?李凯尔特对科学分类问题的观点,可成为我们思考历史科学的他山之石。他认为,科学可以从研究对象和使用方法上加以区分,也就是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来对科学进行分类。在李凯尔特看来,

①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④ 陈立新:《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5页。

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就是所谓科学的“质料分类原则”,但他更强调“形式分类原则”,即根据科学所采用的方法而不是对象来对科学进行分类。在李凯尔特视野里,科学不能如实地认识现实,只能在概念上把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分开,似乎这样科学概念就获得控制现实的权力,而现实也就变成理性的了。“人们在直接谈到‘历史’时,经常指的是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而且,把历史作为特殊的东西和自然作为普遍的东西对立起来的看法,恰恰在哲学中颇为流行。”^①

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成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对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有效的普遍联系和规律,故必须采用“普遍化的方法”。由此,自然科学试图于外在条件的普遍联系中来求证人的存在根据,表现的是人在外部世界中的受动性;“历史科学”是在哲学层面上论说的,旨在剖析人的自由创造力。也就是说,历史科学关注和研究的是人和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过程。对此,维科也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角度进行揭示,认为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后者不是。在《新科学》中,维科借助于所谓“诗性智慧”来论述人类世界的产生,即由激情和冲动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实践。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维科建构起他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其宗旨是揭示出人类社会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这个事实,并具体描绘出“每个民族在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的历史,也就是在时间上经历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②。这就意味着他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不但包括各民族的兴衰史,而且包括揭示社会的本质。这与马克思在历史开端、世界历史方面相互融通。

反观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果它要被阐释成某种“科学”的话,一定是关注人的历史生成与发展的总体的科学。它绝不是把各部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直接归并自身,这不太可能且也无必要,因为人的历史发展才是“历史科学”的理论终局。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物质生产实践,赋予历史科学以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之圈出一个永恒主题:历史的和现实的人。在《形态》之“费尔巴哈”里,马克思曾批评他那个时代之前的历史观,认为他们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③据此,历史科学所阐明的,是市民社会中人自身的生存活动,海德格尔曾提及:“如果不从本真的生存活动着眼,那又该怎样来规定生存的本真性呢?”^④相比较之下,在黑格尔等人的思辨历史哲学中,历史这副扑克牌游戏中只有抽象思辨的“大王”,而没有实实在在的“人”,而在自然科学里,又呈现出“见物不见人”的状态。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正如尼采所批评的那样:“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⑤

卡尔曾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做出评价:“马克思部分分享了黑格尔的禁止朝将来看的观点,主要把他的学说稳固地扎根于过去历史之中,但由于其主题的性质而被迫把他那个无阶级社会的绝对观念延伸到未来之中。”^⑥故马克思在此所指称的“历史科学”,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的“科学”,或是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新哲学。倘若将马克思指称的“历史科学”视为其新科学观的诞生,这虽然意识到“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上的同一性,但仍不免产生依循自然科学来解释“历史科学”之嫌。

在人这个主体性的根基上,“历史科学”由以产生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在市民社会这个历史“舞台”上,“历史科学”由于关注人的历史生成与发展而成为一门总体的“科学”。

●作者简介:卢德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李 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111301020005)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页。

②维 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④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69页。

⑤尼 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5页。

⑥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6页。